

〔法〕阿兰·德布瓦西厄著



跟随戴高乐将军

世界知识出版社

跟随戴高乐将军

1946—1970

〔法〕阿兰·德布瓦西厄 著

余德全 金 森 等译

（内部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Alain de Boissieu
POUR SERVIR LE GÉNÉRAL

Librairie Plon, Paris, 1982

本书根据巴黎普隆出版社1982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赵大鵬

跟随戴高乐将军

1946—1970

【法】阿兰·德布瓦西尼 著

余德全 金 森 等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9.75 字数：213,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600

书号：3003·1716 定价：1.30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跟随戴高乐将军》一书的作者阿兰·德布瓦西厄，是法国军队的高级将领、戴高乐的女婿。作者与戴高乐过从甚密，因积极支持戴高乐的政治主张而深得其信任。戴高乐在处理一些重要问题时亦经常听取他的意见。

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两部叙述戴高乐思想和生平的回忆录。第一部名为《同戴高乐一起战斗（1940—1946年）》。本书是作者的第二部回忆录，出版于1982年，叙述了戴高乐后半生的经历。作者以1946—1970年期间的法国政局和对外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为背景，记述了这一时期戴高乐的思想、观点和作出的某些决策，以及戴高乐同法国国内左、右两翼政党和其他势力之间的矛盾、斗争。作者在叙述这些重大事件中，还同时叙述了戴高乐同他的接触来往和私下交谈的情况，汇集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例如：戴高乐对五十年代越南与黑非洲法语地区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态度；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对法国政治的影响和戴高乐在这些问题上的主张；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情况以及他对法国党派政治体制的观点；1968年5月事件对法国政局的影响和戴高乐最终退出政坛的内幕（在后一个问题上，本书叙述的内容与蓬皮杜回忆录中谈到的情况不尽相同）等。

作者在叙述某些重大事件时也反映出他的政治思想倾

向，如在谈到对黑非洲的“土著政策”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等问题时，作者显然是站在资产阶级、殖民主义和反共立场上的。希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加以分析和鉴别。但总的来说，这是一部颇有史料价值的书，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戴高乐思想和性格，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法国政局的风云变幻以及戴高乐的历史作用和某些重大国际事件的演变，都是很有裨益的。

参加本书翻译的，按译文先后分别为：朱邦造、孙昆山、赵立兴、杨桂荣、赵宝珍、金森、余德全。

目 录

第一章	在国防部总参谋部.....	(1)
第二章	在布拉柴维尔任国防部驻法属 赤道非洲常任秘书.....	(19)
第三章	法兰西人民联盟.....	(53)
第四章	阿尔及利亚.....	(83)
	一、戴高乐将军重新掌权前后 (1956— 1959年)	
第五章	阿尔及利亚.....	(127)
	二、为停火进行交涉的艰难阶段 (1959— 1962年)	
第六章	勒珀蒂—克拉马刺杀事件.....	(168)
第七章	1968年5月的日日夜夜.....	(190)
第八章	在科隆贝双教堂的家中.....	(214)
第九章	戴高乐将军的女婿，共和国总统 的女婿.....	(247)
后记	戴高乐将军的遗嘱.....	(290)
附录		(292)

第一章

在国防部总参谋部

我已将列车重新纳入轨道，那些政党想阻止我照章驾驶这列火车，那就让它们来试一试吧。它们以为可以依靠哗众取宠来治理国家，但它们很快就会发觉自己错了。如果我也陷入多党制之中，那么，法国就没有任何指望了。

戴高乐将军

1946年2月于马利

我是在1946年1月3日同戴高乐将军的女儿伊丽莎白结婚的。在此之前几个星期，我曾请求戴高乐将军允许我离开他的军事办公室，以便把公务上的联系和家庭关系区分开来。何况我们将要住在我未来的岳父母租借的布洛涅森林别墅地产内的一幢小房子里。根据在巴黎住下来的这种可能性，将军同我一起考虑了可能作出的种种选择。在他同军事办公室的路易·托松上校商量之后，便决定让我在旅行结婚回来后，就进军事学校继续学习参谋课程。

我们这次要到摩洛哥去旅行，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就可以避开好奇的记者；再说，这个国家也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第二装甲师在摩洛哥驻防期间，我们几乎没有在这

个国家游览过；而且，我的未婚妻对它还是毫无所知，这一次，我们可以一同去神奇无比的马拉喀什、非斯和拉巴特等地区观光。我的假期有限，不能乘船旅行，因此必须乘坐飞机。然而，在1946年1月，法国航空公司尚未开辟定期航线。而空运也只限于接运家眷及其子女回国，但在通常情况下，飞机从巴黎起飞时，乘客并不多。不久以前，杜鲁门总统赠送给法国总理一架飞机。于是，戴高乐将军军事办公室的飞机驾驶员苏弗莱上校，就考虑让这架飞机也参加接运家属。就这样，我们在1946年1月4日动身去摩洛哥。

我们是在布洛涅森林别墅举行婚礼的。我们回来时，发现那里空荡荡地十分凄凉，因为我的岳父母已决定离开首都，到马利居住，他们向房地产局租借了一处国有房地产，等待着科隆贝的拉布瓦塞里邸宅的修缮工程竣工。于是我们就住在那幢小房子里，同时另外寻找别的住所。我去军事学校往返都骑自行车，因为那个地方未通公共汽车，这倒使我可以保持体力健壮。参谋学习班的气氛是令人惬意的。学习班的负责人马尔索—德米约将军鉴于学员已具有坚实的作战经验，便要求教师采取交流经验的方法，而不要灌输某种并不存在的理论。这种方法叫做“发现法”，它使每个人都可以从学员提出的种种答案中进行选择。硬性规定要学习的，只有战术推理的方法，它的极大好处是迫使每个人都要考虑到作出决策的所有因素，并且按照同一要求完成作业。同所有方法一样，这种方法也是可以商榷的。但是，对我们来说，采取这种方法是有很大大价值的。

在参谋学习班，我们曾有机会去访问驻防德国的一些部队，听取了根据战时的经验实行新编制的情况介绍。当时，我们发现，几乎普遍采用了在第二装甲师已经成为制度。

甚至几乎成为建制的军兵种混编的做法。驻德部队享受着占领军的舒适的生活待遇，部队确实管理得很好。同驻守法国本土的、自1940年以来一直住在年久失修、死气沉沉的兵营里的部队相比，他们的条件是优越的。为了弥补这一不足，陆军总监德拉特尔将军曾有过建立简便营房的想法。这在当时是一个好办法。可惜，这些简便营房花费太大，使用期不长，而永久性的军事建筑则仍在遭到损坏。这类建筑的命运、驻军的迁出城市、武器的制造、部队的编制，这些就是陆军参谋部交给我们的研究课题。因为当时还没有陆军学校，也没有高等军事研究中心，我们这里就成了一种试验的基地。结果，指定我们执行的，基本上是一个高级军事研究计划。可见，战后开设这个参谋学习班是很有益处的。

实习期结束之后，我们面临不同的职业选择，不过，我们每人还要选修一门专修课。我选了第二局（即情报局）^①的课程，因为我认为，研究外国军队，研究有关其他国家防务政策的观念，是当时最有意思的任务。专修课结束后，必须选择一个工作单位。我同戴高乐将军商量了一下，他要我以他的名义去征求朱安将军的意见。朱安将军是当时设在大陆饭店的国防部的总参谋长。他请贝德隆上校接见了。上校建议我到国防部总参谋部负责情报工作的第二处去，以便研究法国派驻世界各国的武官报回的材料。

第二处处长是斯塔尼亚罗上校，他性格刚毅、聪慧过人，他的分析和综合能力简直非比寻常。我刚到这个处，他就给我交待了任务。他说：“你就负责美洲，给我写一份关

① 指法国国防部第二局。——译者

于美洲大陆战略防务问题的调查报告。你写这份报告时要利用报章杂志，利用我们的武官和驻外的专门机构，想方设法给朱安将军搞出一份关于北美洲人、中美洲人和南美洲人对本国防务设想的书面材料。”题目出得太大，所以我起初还以为是开玩笑，只好莞尔而笑。可是，斯塔尼亚罗上校十分严肃地盯着我，又把这项任务重复了一遍。我颇为惊异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为了撰写这份调查报告，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仔细翻阅各种专业杂志以及同驻各国武官的往来信件，还翻阅了向各专门机构发出的对这一问题的某个方面进行研究的机密指令。工作量很大，但却饶有兴味。中间只是由于到伦敦出差，才暂停了一段时间。那一次到伦敦去，是同我们的武官昂热诺将军一起研究我们的英国邻居战后如何在某些部门改组情报机构的情况，以便为朱安将军写出一份调查报告。斯塔尼亚罗上校对我说过，朱安将军确实希望借鉴我们邻居的体制，对我们自己的体制进行整顿，以免各个机构以及陆海空军第二局之间相互发生竞争。

我在国防部总参谋部工作期间，再次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印度支那事务。1946年7月12日，正值枫丹白露会议举行之际，我收到了旧日在印度洋时的上司、当时的巴黎军区司令勒让蒂约姆将军给我的回信。他在回信中告诉我说：“越南代表团希望我去印度支那接替达让利厄……越南代表团的成员对我说，我是唯一能够在法国人和安南人之间重新建立相互信任的人。我应邀会见了胡志明，同他会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他十分坦率，但他对参加枫丹白露会议的法国代表团的组成，却表示不能理解。他明确地告诉我，将在枫丹白露缔结的协定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负责就地实施协定的人

选。他对我说，达让利厄不是这样的人……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吧。”

我把这封信交给斯塔尼亚罗上校，他让我把信带去给朱安将军看。我向他指出，信的末尾写着：“目前，对我上面给你写的一切要严格保密”。于是，他把信交还给我，但又劝我把信送给戴高乐将军一阅。我很快就有机会把信念给我的岳父听，他几乎一字不差地回答我说：“我既不同勒让蒂约姆将军，也不同达让利厄海军上将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关于那里的局势，除了在报上看到的以外，我并没有什么情报。我已经没有责任了。我不相信现政权能够克服印度支那的危机。胡志明这张牌，或许戴高乐还可以打一打，如果他还管事的话。再说，胡志明也要求见我……不过我没有接待他，因为象现在这样的政权，是没有能力抵御一股革命力量的。社会党主管海外事务的老先生们都属于保守派。我在印度支那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到最终要给予印度支那以独立时，会上只有三人赞成。那是三个自由法兰西分子：德朗格拉德总督，洛朗蒂总督和我自己。我还听说，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缠住秘书长，不让会议记录里出现这句话……”后来，弗朗索瓦·德朗格拉德在给我的信中^①证实了此事。

那么，在对印度支那应奉行何种政策的问题上，法国政府当时采取了什么立场呢？在国防部总参谋部当时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中，印支问题本来应该是最主要的问题。在我的第一部回忆录^②中，我曾谈到，戴高乐将军试图让永珊皇帝^③

① 见附录中的信。

② 即作者所著《同戴高乐一起战斗(1940—1946)》一书。——译者

③ 前安南皇帝，是最古老的阮王朝王室的最后一代继承人，1916年被废黜并流放到留尼汪岛，1942年被“自由法兰西军”招募为志愿兵。1945年12月26日在班吉因飞机失事身亡，当时他的化名是唯成少校。

复位，以便朝着建立一个联邦的方向前进，这个联邦将包括合并在一起的东京、安南和交趾支那，然后再让老挝和柬埔寨加入。对于政府来说，它的行动宪章就是1945年3月24日的声明。这项声明重申了这一政治意图。声明说：“印度支那联邦将同法国以及这个共同体的其他部分组成一个法兰西联邦，由法国代表法兰西联邦的利益。印度支那在联邦之内将享有自身的自由……印度支那的地位将由获得解放的印度支那的各个有资格的机构经过磋商以后加以确定。”

戴高乐将军曾指定达让利厄海军上将以高级专员和总司令的身份实施这项政策。这位海军上将过去是加尔默罗会修士，也当过解放勋位管理会总管。他曾要求在战争结束后回到他的修道院去。人们经常问我，为什么会选中这位可尊敬的神甫路易·德拉特立尼泰^①的呢？我的回答是，戴高乐将军毫不掩饰他对路易·德拉特立尼泰神甫的友谊和敬重。他私下常说，他认为这位神甫有朝一日会成为教皇左右的教廷枢机主教。不过，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②在当时却暂时放弃了他的计划，因为他知道，印支问题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因此必须为此搭起一个最好的班子。在他的思想上，明智的办法似乎是把1940年9—10月加蓬战役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的班子重新组建起来。此外，还应当指派一个熟悉亚洲问题的法国权威人士到那里去。而达让利厄海军上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大部分时间，是担任自由法兰西负责法属太平洋领地的高级专员。当时，处境十分艰难，但无论是在存在日本入侵的威胁时，还是在美国军队到达时，他都表现得

① 海军上将达让利厄的教名，“拉特立尼泰”系“三位一体”(La Trinité)的音译。——译者

② 指戴高乐将军。——译者

很出色。再说，戴高乐将军认为，作为接替在印度支那享有很高威信的古德海军上将的人选，另一位海军上将“将会以海军军官的方式把过渡阶段的各项事宜安排妥当的。”

达让利厄海军上将不愿兼任高级专员和总司令。他向戴高乐将军提出，“仅仅是高级专员的职责就已经够繁重的了。”戴高乐将军的回答是，他不希望看到权力的争斗，所有的权力要集中于高级专员的手中。这种方式是他在自由法兰西时期为其他负责人选定的：卡特鲁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勒让蒂约姆在印度洋，都是如此。他认为，这种方式已经证明是正确的。而且，为了避免引起任何争议起见，将先任命达让利厄为海军中将，然后再任命他为海军上将。达让利厄海军上将收到了勒克莱尔将军向他表示完全忠诚的一封正式电报，便趁机对一些问题作了澄清。他说：“我对您既怀有深深的敬意，又有着在为法兰西服务的过程中结下的真挚友谊。1940年，我曾根据您的命令妥善处理了加蓬的问题。今天，一种奇特的巧合使我成了您的上级，以便共同完成一项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我们将在友好的气氛中完成这项任务。——Free french^①。”

我在我的第一部回忆录中回顾了戴高乐将军引退的情况。与唯成失事身亡仅有数日之隔的戴高乐将军引退一事，使达让利厄海军上将陷入了焦急不安、乃至沮丧之中。他当时几乎要弃甲归田了。在同戴高乐将军交换信件后，他本想要放弃自己的计划的。这位海军上将请求费利克斯·古安政府给予新的指示，费利克斯·古安向他确认了戴高乐将军向他下达的全部指示（除了永珊复位，但却考虑让保大复位）。

① 英语，意为“自由法兰西人”。——译者

达让利厄海军上将在到达西贡时发表了一篇讲话，宣称他“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巩固同安南人民的悠久的亲密关系”。由于殖民地或保护国地位已不复存在，他愿实现法国所允诺的“自身的自由”。他立即成立了一个联邦委员会，然后由各国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在这位高级专员看来，“组成印度支那联邦的五个国家：东京、安南、交趾支那、柬埔寨和老挝，它们的文化、种族和传统都是有区别的。在印支联邦中，它们应该保持自己的特征。”他写道：“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这些区别是理所当然的，其目标是联合，而不是分裂。当意识形态旋风在东南亚特别猖獗的情况下，一种健康的哲学思想使它们及时地受到了启迪……或许，它们是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和反殖民主义的拥护者，它们携起手来，与日本合谋，以摧毁遗留下来的法国秩序，它们建立起来的当然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新的国家，那是饰以民族主义标记的上层建筑。”今天重读这段话，就必须承认，近年来的事变充分证明海军上将的说法是正确的：他是根据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的理想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比起当时的某些“专家”们来要胜一筹。

这位高级专员的首要目标是恢复秩序、安全与和平。勒克莱尔将军的远征军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在大战期间，老挝和柬埔寨曾在不同程度上被暹罗兼并，而这支军队的灵活行动及其取得的胜利却使这两个国家的君主恢复了自己的王位。至于法国的殖民地交趾支那，海军上将认为，它应该在预期成立的联邦范围内恢复自治，但为此它首先应该摆脱无政府状态；然后再征询民意，使他们的未来符合他们自己的愿望。

在河内，胡志明于1945年8月16日夺取了政权，并宣布

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面对河内的革命政府，这位高级专员根据接到的指令，“继续观察，但不拒绝交谈”。确实，我们国防部的情报机构都非常清楚，虽然北方大部分的居民承认胡志明是他们的领袖，但胡志明也不乏有朝一日可能战胜他的对手。在海军上将看来，主要问题还不是胡志明，而是从东京撤出中国人的问题以及在这块土地上毋宁说是受到欺侮的我国同胞的命运问题。

因此，绝对必须签署1946年3月6日同胡志明达成的各项协定，尤其是因为在当时美国似乎不再愿意间接卷入印度支那问题的情况下，胡志明需要有一个大国来帮助他对付中国。这些协定导致了勒克莱尔将军的远征军登陆，拯救了被关押或拘留在河内的我国同胞。但是，我们和胡志明之间很快就出现了争执。胡志明不满足于得到东京，进而要求实现东京、安南和交趾支那的合并，并得到让整个越南在他的控制下获得独立的承诺。

这些要求使大叻会议于1946年5月11日宣告失败。同某些著作论述的相反，会议的失败绝非这位高级专员的毫不妥协所使然，因为在他看来，三地合并也是唯成的要求，而戴高乐将军并未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胡志明提出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严格控制下的三地合并，与唯成提出的在重新获得自由这一条件下的三地合并，两者是有区别的。无论如何，3月6日的各项协定规定要征询民意，因此，决定这方面的前途，根本不属于海军上将的职责范围。

大叻会议流产后，双方商定，悬而未决的问题将在随后举行的枫丹白露会议上予以解决。这次会议定于7月6日召开。会议之前，有一个越南代表团于1946年4、5月份到达巴黎进行了友好访问。5月31日，胡志明也乘飞机来到法国。而

当时的法国政府，刚刚在选举中失利，成为少数派，巴黎已经没有内阁出面接待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了！因此，我们的客人便被邀请到法国南部去度假……

几天以后，新的政府总理乔治·皮杜尔正式迎接了胡志明，并向他宣布，皮杜尔和达让利厄海军上将都不参加枫丹白露的谈判，以便在发生争执时充当调停人。这当然使胡志明感到不快，他向巴黎军区司令勒让蒂约姆将军大发怨言，他是出于昔日的友谊邀请后者前来会面的。

在枫丹白露会议期间，交趾支那自治共和国于6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了。这是很大一部分西贡居民所要求的，他们不相信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当然，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解决办法，因为宣告成立的文件明确指出，根据“1946年3月6日初步协议”的规定，将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征询前殖民地居民的意见。我当时在国防部总参谋部工作，所以我可以证实法国政府曾赞同这一决定。把责任推给达让利厄海军上将，这同我在国防部总参谋部的所见所闻是完全相反的，而且我还是在“情报”处工作的呢。另外，雷蒙·阿隆1975年4月4日在《费加罗报》上发表文章，指责达让利厄海军上将策划了这一阴谋，但是几天以后，他又不得不倒退回来，承认交趾支那的自治政府是在枫丹白露会议召开前一个多月组成的。这次会议结束时并未达成协议。

回到河内以后，胡志明意识到，尽管签署了一项临时协议，他的威信仍然由于在枫丹白露的失败而受到了影响。10月18日，达让利厄海军上将在金兰湾会见了胡志明，同他一起商议旨在制止处决和谋杀事件的措施。但是，11月20日，一艘中国走私船被法国海军扣留。一些所谓不受胡志明控制的人试图解救这条帆船，他们向法国人开了火。法国人给予

了有力的还击，并恢复了秩序。当时，海军上将还在法国，代理高级专员瓦吕伊将军认为，在出现了一系列特别严重的谋杀事件之后，事态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他命令海防法军指挥官控制这座城市，恢复城里的秩序。因此引起法越谈判的破裂，并使双方以武力相向的就是这桩海关检查事件。毫无疑问，这正是越盟的极端分子所希望的，而海军上将则与此事毫无关联，因为他本人并不在那里。

作为我为他进行辩护的结束语，我要全部引用加尔默罗教会可尊敬的神甫埃利泽·阿尔福对他的评价。我曾从他的分析中得到了启示。这位神甫写了一部非常好的传记《路易·德拉特立尼泰神甫，蒂埃里·达让利厄海军上将》。他写道：“对于成为达让利厄海军上将的这位修士，必须考虑到，我们说到过的教皇庇厄十一世关于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项通谕在这个教士的灵魂中所产生的反响，才能理解是什么东西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态度。他命中注定要向纳粹主义进行战斗，直到取得胜利。局势使他有机会在地球上的某一地方同共产主义作战。他没有象别人那样信任胡志明，因为胡志明从20岁起就是一个痼习已成的共产党人。在1920年的图尔大会上，胡志明是共产国际的唯一代表，而且他在莫斯科受训期间，不仅接受了技术教育，而且接受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这位修士在内心深处把自己的使命视为最好意义上的一场十字军东征。或许，他以比别人更锐利的目光更深刻的直观和更长远的观点，看清了斗争的关键所在。我们不要去多谈事变的结局，也不要去滥用这一论据。但是，当人们想要对他在印度支那的态度作出最终评价时，则必须把这一点考虑在内。”

可以肯定，永珊亲王的死，对于达让利厄海军上将如同